

大数据解析全球传播学学科制度化发展的历程与规律¹

冯广超

摘要

本文系统地梳理了全球传播学学科制度化发展的历程,实证分析了影响传播学院系学术表现的的决定性因素。研究发现,传播学学科有言语传播、新闻教育、农业传播、公关关系、技术传播等多个源头,在其发展过程中,部分高校选择始终沿着单个源头独立发展,部分则选择将多个源头进行合并或重组。同时,传播学学科越发达、历史越悠久的高校存在着更多的传播学院系,学科的建制也越复杂、越少改变。此外,传播学院系的科研型教师越多、研究越有持续性、学者跨学科能力越强、学术合作网络越广、角色越关键,其院系的整体学术研究表现就越好。

关键词

大数据、传播学、发展史、学科建设、制度化

作者简介

冯广超,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邮箱:fffchao@gmail.com。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数据背景下学龄儿童新媒体使用与身心健康关系的实验研究,基金号:18BXW082)的资助。

A Big Data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ary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FENG Guangchao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history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and furth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what factors have determined the research performance of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s. This study finds that communication schools stem from multiple sources, including speech, practical journalism, agricultural journalism, public relations,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etc., and some organizations, opt to follow along with the original sources, while some choose to merge multiple sources within the same university or to restructure themselves by other means.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eterminants of the research performance of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s sh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appropriate graduate-level curriculum aiming for strengthening the cross-disciplinary ability, having more collaborations and exchanges with leading overseas schools, and appreciating the importance of focused research of current and potential faculty members.

Keywords

Big data, communication,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history

Author

Feng Guangchao,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This research is supported in part by the gran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aged children's new media use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n the era of big data" (Grant No.18bxw082).

一、导论

“传播”一词可以指代具有层级所属关系的概念（concept）、领域（field）和学科（discipline）中的任意一个。如果我们把“传播”作为一门学科来看，那么这个学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应该以哪些概念和领域作为核心进行构建？围绕着传播学学科认识论和本体论展开的跨世纪的持久争论，导致了传播学学科出现了千差万别的学科存在方式、形态和结构，而形成这些差别的根源则在于一个地区及高校学科制度建设所特有的传统和结构。

建立学科是大学对知识进行识别、排序和分类的重要机制和原则（Zelizer, 2016）。建立学科需要制定标准，凝聚内部共识和力量，建立组织化的交往方式；确定自己的研究主题（subject matter）、问题和专业领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并能产生权威、形成制度化的机构（常文磊，2014；方文，2008；王怡红，2012；Jensen, 2002；Zelizer, 2016）。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知识的生产结构、方式和制度构成了学科的内涵（常文磊，2014）。其中，学科的制度结构或基础架构（infrastructure）包括了四个基本类别：专业化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如大学院系）、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以及稳定的基金资助来源（方文，2008；Craig, 2012）。在学科的基础架构中，高校的院系等研究机构是学科和学者身份（identity）的标识和社会范畴化线索（方文，2008；Abbott, 2001；Becher, 1989）。因而，学科的资金积累和呈现过程主要是通过高校的院系来实现的。各个院系均是应学科分化与综合的需要建立起来的（韩水法，2002），其在学

校组织架构中的位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的地位（Sproule，2008）。系、学院、学部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学校或在同一学校的不同时期皆有可能不同²，此中充斥着校董会（board of regents/trustees/governors）、学校管理层和教职员工会之间的博弈，同时也是大学内部学科权力争夺和资源分配的结果（李金铨，2014）。对权力的争夺也深深地影响着知识的生产方式和传播（Bourdieu，1975，1984，1986）。不同资本之间相互转化，研究者及院系对资本的占有量影响了他们的研究习惯和品味，决定了他们的学科发展战略、策略以及进行研究实践活动时作业模式的选择。而且，这些战略及实践活动能否最大程度地追求院系内部和谐，并与外部有所区分，也体现了学科的身份（Bourdieu，1984，1986；Zelizer，2016）。

二、传播学学科的起源、发展过程与规律

（一）传播学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困扰传播学学科合法性的第一个问题是其学科起源的神秘性（Pooley，2008）。现今学界一般认为，传播学学科的传统最早起源于人文学科衍生出来的修辞与言语（speech）传播和新闻职业教育（Daly，Friedrich & Vangelisti，1990；Peters，1986）。修辞与言语传播通常是培养辩论之才，在政治选举和商业应用中需求很高；而新闻职业教育则为19世纪中期开始的如火如荼的美国新闻业输送了高学历的劳动力。但是，这两个传统均强调实践技能的培训，并未形成学科的意识。直至1950年代，传播学才开始初步确立了学科的独立身份。然而，“传播学科”是否还有其他源头？学科发展是以言语或新闻职业教育的实践教育为主、在其中加入基础传播研究的成分，还是以基础传播为核心、附带提供新闻等职业教育？诸如此类问题的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学科发展策略，出身及发展理念皆不同的学科建设者们在为了获得学科的合法性和正统性的“斗争”中推动着学科的演进（Sproule，2008）。

研究问题一：传播学学科机构的发展源头、现状和一般规律是什么？

（二）传播学研究机构的学术表现及其影响因素

一些基于制度主义视角研究学术表现的文献（Johnes，1988）鲜有理论支撑，更多的是经验及观察形成的变量。祝建华（2002）在一个探索性研究中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认为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程度由个人学术训练背景和机构的奖惩机制所决定，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经验研究的验证。

从学科制度的视角来看，学术表现影响的是学科的合法性。学科的合法性在科

学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有赖于学科制度的支撑（方文，2008）。但是，学科制度结构的建立仍不足以确保学科的合法性，因为学科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科知识传统积累的学术水准和学界声望（王怡红，2012）。因此，学科合法性的建构更重要的是通过知识或思想（intellectual）（能够通过知识权威发现并产出体系化的伟大思想和方法）、研究机构（institutional）（在官僚体系和组织中产生机构权威）和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能与大众社会的认知和实践产生共鸣的社会文化权威）三方面的有效组合产生享有符号资本的权威（方文，2008），进而来捍卫学科的合法性。

布尔迪厄（Bourdieu，1975）认为，研究者（包括机构）追求科学利益最大化的动机的强弱取决于其拥有资源的多寡以及资源能够带来的权力的大小。学科以研究机构为识别符号和堡垒来积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³和社会资本⁴，并将三者汇集成符号资本，进而形成学科发展的核心资源，最终决定个体研究机构的发展战略、研究习惯、品味、内容（实践）、学术表现⁵以及学科整体的发展规律（Bourdieu，1975，1984，1986）。很多经验研究也印证了上述资本对于学术表现的影响（Gulbrandsen & Smeby，2005；Luukkonen，1990）。

机构由人构成，其主要通过规章制度和战略等的制定来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以实现机构的目标（Miller，2010）。由此，院系的学科发展战略（包含院系的机构形式⁶、院系研究领域的持续性和院系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战略⁷）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整体研究表现。因而，我们认为传播学院系的学术表现受其院系的科研发展战略、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包含院系的研究积累、院系发文学者数，以及该地区的平均英语能力⁸）、社会和经济资本等方面的影响，如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19年大学经费收入（Times Higher Education，2018）。以上构思即为指导本论文分析的理论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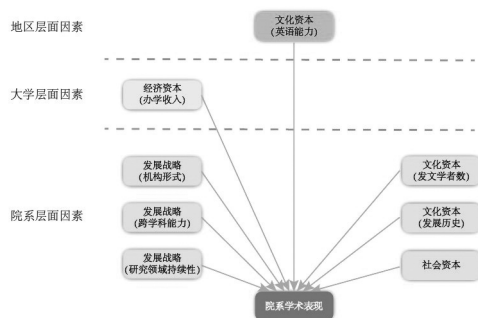


图1：理论框架

此理论框架基本上是关于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的演绎，但由于本研究是将属于批判传统的宏大（grand）理论降为了实证的中层（middle range）理论（Merton, 1968），且这一理论还未被用于讨论学术表现的研究，因此，作者无法直接提出具有明确因果关系的研究假设。对此，本研究提出了如下两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二：全球传播学院系的学科实力分布如何？

研究问题三：全球传播学院系的学术表现如何受院系的发展战略、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本等因素的影响？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大数据挖掘的方法分析了1900年以来发表的与传播学相关的重要论文，辅以对传播学院系的历史档案的分析。

（一）数据获取

首先，基于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研究者选择了SSCI、SCI和A&HCI三大索引，检索传播学学科（包括了WoS数据库中传播学、电影、广播及电视类别）收录的所有期刊（共计138个）。⁹其次，考虑到传播学的跨学科特性，研究者又以传播学学科作者的通信地址是否含有如下任一名称（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media, advertising, television, telecommunication, speech, speaking, oratory和rhetoric）为检索标准进行搜索。此外，为了补充可能的缺漏，研究者还以title（题目）包含Internet（并且topic包含media），communication, media, advertising, television以及topic包含journalism进行了搜索。搜索结果截止至2019年4月，共获得了1900年至2019年共120年的论文数据，其中包括9212本期刊收录的420993篇论文，以及这些论文的被引论文5123245篇；论文作者来自于161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对无关数据¹⁰进行筛选后，保留了218825篇论文及其被引论文2001535篇，此中涉及4273本期刊、148个国家和地区、111348名学者。其中，传播学院系，即以涵盖专业的范围来界定（李金铨，2014），发表的论文数共计74499篇，散布于2841本期刊，涉及86个国家和地区、1571个一级机构、1916个二级机构、24590个学者。此外，为验证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作者及其研究助理、博士生和研究生分别人工访问了数据中出现的所有传播学院系（包括专业）网站及其所属大学网站，以全面了解其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机构存在形式等）。

（二）模型建立及数据分析过程

学科的历史研究根据其自身的属性和特征通常采取三种方法，¹¹即描述学者事

迹的传记史 (biographical)、记录某种思想和理论的智慧史 (intellectual) 和专注科学机构的机构与制度史 (institutional) (Löblich & Scheu, 2011)。由于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源于学科制度精英在学科制度建设和学术思想与理论发展中符号霸权化的过程 (方文, 2008), 因此孤立地采用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可能成为合理化现状的辉格史 (Whiggish) 或庆典史。故而, 合理的做法则是组合使用三种方法 (Löblich & Scheu, 2011)。学科的发展总体上是知识行动者 (包括精英) 及其思想与所属学科甚至是所处社会制度动态交错的结果 (方文, 2008)。因而本文的分析采用学科制度结构的视角, 创造性地以思想——知识行动者 (作者)——所属研究机构——所属社会环境的基础关系数据, 构建了传播学院系——大学——国家/地区的三层多水平 (multi-level) 大数据 (见图1), 进而对传播学学科的发展历史进行数学建模和统计推断分析, 以期揭示传播学学科的动态规律和趋势。

本研究的因变量——传播学院系的学术表现, 由8个变量构成的量表, 具体包括发表论文总数、在《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 及《人类传播研究》(*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三个顶级期刊¹²发表的论文总数、发表在SSCI/SCI 1区的论文总数、发表的期刊总数、总引用量、三大期刊的引用量、发表在SSCI/SCI 1区的论文引用量、机构h-index (Huang, 2012) 来测量, 然后通过主成分分析 (PCA) 形成唯一的院系学术表现因子值。¹³自变量包括了: 学科发展战略 (包含院系的机构形式¹⁴、院系研究领域的持续性¹⁵和院系研究的跨学科能力¹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 (包含院系的科研历史的长短、发文学者数以及该地区的平均英语能力 (EF SET, 2018)、社会资本¹⁷和经济资本, 即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2019年大学经费收入 (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18))。

本研究的分析主要采用了三层多水平统计建模的方法。以院系为第一层的分析单位, 对作者的论文 (思想) 属性信息进行量化、累积计算 (aggregate), 形成院系层面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院系所属的大学为第二层面因素 (大学的经费收入等), 大学所属的国家/地区是第三层面的因素 (平均英语能力), 第一层面 (院系) 的自变量、第二和第三层面的因素共同影响院系的研究表现 (第一层面的因变量)。

本研究的数据爬取和清洗在Hadoop加Spark的分布式环境下依赖PySpark等包进行, 数据统计分析主要采用R 3.5的lme4等包, 社会网络分析和绘图主要使用Python的NetworkX等包。

四、研究结果

（一）传播学学科机构的制度化进程

为了准确回答第一个研究问题，研究者基于所获取的大数据，在梳理出传播学院系名称演进的规律后，又通过参阅历史档案和文献信息进行了辅助支持和交叉验证。

1. 传播学学科机构的源头与演进过程

通过对获取的100多年来传播学机构的数据进行梳理后，研究者发现传播学的源头不但有文献已经提到过的言语和新闻职业教育，还有农业传播、公共关系和技术传播等其他源头，而且这些源头在不同的高校有着完全不同的演进路径。

单是言语这个源头就派生出了言语传播学、言语科学和言语表演艺术三个主要的分支。言语系在1940年代时多数改为言语传播系（speech communication），¹⁸1980年后大部分又改名为传播学系（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arts）。¹⁹部分在传播学系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升级为学院（如西北大学的传播学院等）。而表演艺术方向的言语派系则因言语传播系的传播社会科学化而与其日行渐远。部分大学去除言语，转向戏剧艺术，完全离开了传播学科，但更多的院校选择了两派分家、各自独立发展：言语朝言语传播——传播学系方向发展；戏剧则与电影等表演艺术、设计、舞蹈等合在一起，成立表演学院或创意媒体学院等。社会科学化的言语派逐渐演变成了传播学系，而另外一派则自然科学化，研究如口吃、听力等沟通障碍和疾病（pathology/disorders）的言语问题，逐渐发展成了言语和听力科学系。除个别大学（如西北大学传播学院等）外，言语科学在大部分学校已经与传播学院（系）分家，部分院校（如亚利桑那大学）甚至还被划分到了自然科学学部或医（药）学院下面（见图2）。

密苏里、哥伦比亚、西北大学的麦迪尔（Medill）新闻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院系等自创立以来始终强调新闻实务和职业教育，而非学术研究，²⁰且新闻学院的名字至今仍保持不变。²¹新闻专业的学术化之路由布莱尔（Willard Bleyer）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开拓、并发扬光大（Rogers, 1994）。1970年代开始，麦迪逊分校等大部分新闻学院陆续改名为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也有个别学校如北卡罗来纳教堂山分校又进一步改名为媒体与新闻学院。现在，凡是名称中带有“新闻（与大众传播）”的学院基本上均起源于新闻职业教育，随后在新闻职业教育之外也开展大众传播以及其他传播学的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但由于新闻职业的传统在这些学院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因此许多人仍然习惯把它们称为新闻学院

(J-school)。²²部分大学在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基础之上继续壮大,从新闻学院升级为了分量更重的新闻学部(如马里兰大学大学城校区)或传播学部(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也有大学(如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和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等)从新闻学院升级到传播学部后,名称偏向于媒体。现在,凡是名称为“传播学部”或“媒体学院(部)”的均以新闻系为主,并加入了广告系和新媒体研究的通讯系,部分还保留了电影、创意媒体等艺术系或专业。

传播学另外一个重要的流派是农业传播(Ward, 2000)。这一流派的典型代表主要是来自于依靠19世纪末期土地拨赠法案(Morrill Land-Grant Colleges Acts)赠拨土地建立起来的赠地大学,如康奈尔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该大学三个传播学学科的主要源头之一)等。起源于农业新闻的部分院校将农业传播学系设立于农学院名下,而康奈尔大学、麦迪逊分校则分别成功转型为传播学系、科学传播系。这类传统的传播学系专注于学术,尤其是科学和科技传播研究领域,是现今传播学教育和研究的重要阵地。²³

在非上述流派出身、且一起步就按照社会科学范式走完全学术化的传播学发展之路的机构中,最为著名的要数施拉姆创建的几个传播学研究所、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²⁴此外,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是屈指可数的出身于公共关系的示例;²⁵技术(technical)传播则是目前传播学研究领域中为数不多还未完成制度化和机构化的一个方向。²⁶

2. 传播学学科机构的“变”与“不变”

各传播学派系为了争夺学科的正统地位,抑或为了合法化自己的出身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见图2)。本文作者基于数据发现,部分传播学机构经历了频繁的变化,部分则自始至终没有变化或者变化甚微。曾经变化的案例有:从新闻系变为传播学系,如传播学学科的重镇——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系则是从新闻系改名而来;²⁷部分院校将言语传播系与新闻系或大众传播系进行合并,如南加州大学等。²⁸但不变的例子也有很多,²⁹譬如源于言语传播的传播学系(院)与以大众传播研究、新闻实践教育为中心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二者因为学科传统、重心与发展目标的巨大差异,即使在同一所学校也“针锋相对、老死不相往来”(Eadie, 2011)。因此,在同一所大学里(譬如爱荷华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明尼苏达大学、马里兰大学大学城校区、西北大学等)同时存在传播学院(系)与新闻(与传播)学院(部),且互不隶属。更有甚者,在以农业传播为源头的学校中竟形成了农业传播派、言语派和新闻实践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如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密苏里大学、佐治亚大

学、堪萨斯州立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等高校，就同时存在三个言语传播出身的传播系、新闻职业教育出身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农业（科学）传播系，他们互不隶属且与传播学紧密相关的院系（Chaffee & Rogers,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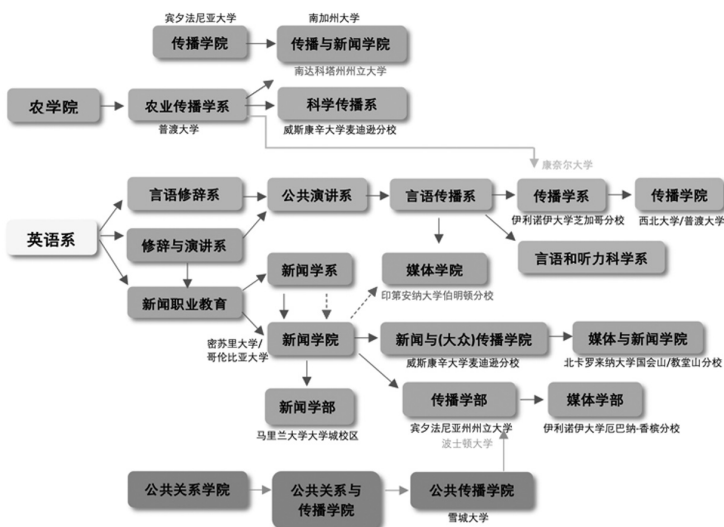


图2：传播学不同流派的起源、演进历程及代表性例子³⁰

3. 传播学学科制度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图3（由社会网络分析生成）总结了全球1540个传播学院系名称的各种组合方式。其中，单个名称的流行程度（颜色柱的深浅）以及各种名称组合出现的数量多寡（线条的粗细）说明了传播学学科机构演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展现状和趋势。在传播学学科内部，新闻、传播、广告、言语以及电影、电视、戏剧等表演艺术等，均呈现了各种形式的排列组合，但以新闻、传播、媒体、新闻与传播、媒体与传播的名称为主（分别占比7%、31%、4%、9%和7%）。这说明虽然传播学学科的源头众多，机构的制度化至少从形式上在众多学校还是形成了基本共识，当然这也更多是制度化中互相模仿的结果（DiMaggio & Powell, 1983）。此外，传播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组合方式也很多样，包含了人文（英语、文学和哲学等）、社会科学（心理学、营销、管理和教育学等）和信息科学。这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交叉学科的传统，也透视了其机构制度化演进的可能方向。近年来许多大学，如阿拉巴马大学塔斯卡卢萨分校和罗格斯大学（Rutgers）等，均在传播学院系的基础上与图书馆和信息管理学院系进行合并，形成了扩大的传播学部或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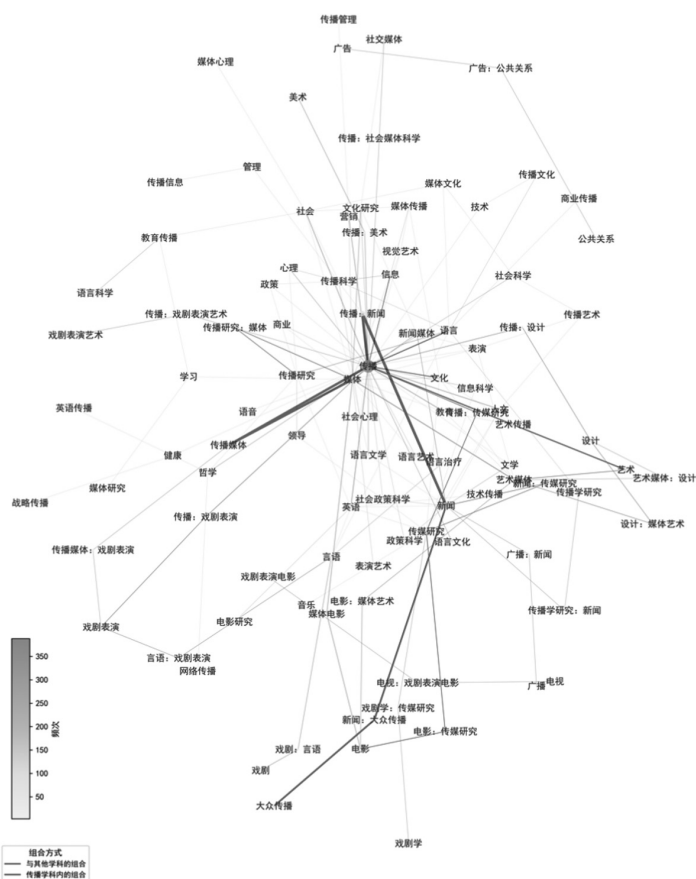


图3: 传播学院系名称的网络关系图³¹

表1：学科制度发展与院系及大学表现的交叉表

		大学是否建立了正式的传播学院系		大学存在的传播学院系数目					传播学院系的名称是否曾经改变	
		建立	没有建立	1个	2个	3个	4个	5个	没有改变	有改变
大学传播学科的整体学术表现	较低表现	435	60	486	12	1	0	0	6	453
	中等表现	380	59	370	68	2	0	0	18	407
	较高表现	283	37	171	116	32	2	1	51	271
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大学综合排名	五星大学	77	26	49	42	7	1	1	7	95
	四星大学	110	26	85	29	11	0	0	13	121
	三星大学	111	16	89	20	6	1	0	15	109
	二星大学	143	16	125	25	3	0	0	5	152
	一星大学	101	8	93	7	1	0	0	2	104

熟、越不愿意进行改革或做出改变。³⁴

（二）传播学院系研究表现的影响因素分析

上述内容总结了传播学研究机构100多年来的制度化历程和纷争。纷繁复杂的制度化形式和过程对研究机构的学术表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研究机构的学术表现还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均属于本部分要回答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研究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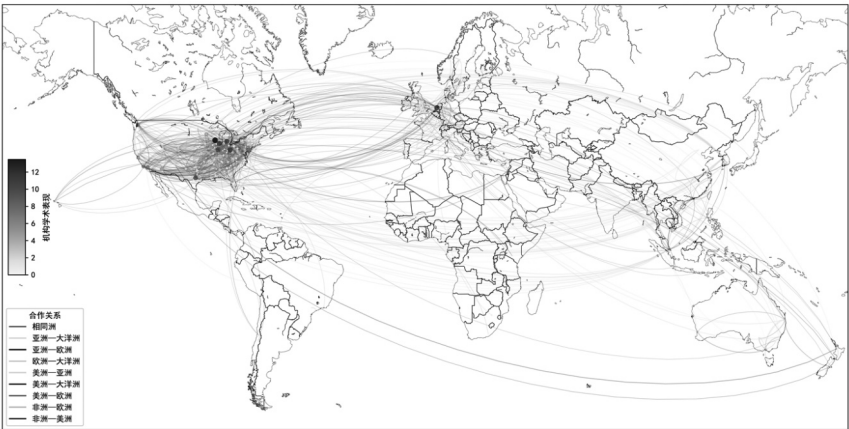


图5：全球传播学院系的学术实力分布与合作关系网络

1. 全球传播学院系研究表现的排名

表2：截至2019年4月各洲排名第一的传播学院系³⁵

院系	院系的全球排名	大学	传播学科全球排名 ³⁶	国家	洲	院系研究表现的因子值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	阿姆斯特丹大学	4	荷兰	欧洲	12.6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rts and Sciences	2	密歇根州立大学	5	美国	北美洲	12.4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20	南洋理工大学	36	新加坡	亚洲	4.2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Arts	74	昆士兰大学	57	澳大利亚	大洋洲	1.4
Centre for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244	比勒陀利亚大学	336	南非	非洲	0.3
Faculty of Communication	309	智利天主教大学	417	智利	南美洲	0.1

表2列出了各洲研究表现（通过上述的主成分分析获得的因子值）³⁷排名第一的传播学院系。图5显示的是全球传播学院系的研究实力（节点大小及颜色深度）分布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美国排名靠前的院系集中在东部地区。从全球的整体情况来看，美国的传播学院系具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前50名中86%来自于美国（图5中的深色和大节点都集中在美国。从线条的走向来看，全球学术合作的中心也在美国）。欧洲的传播学院系分为荷兰和英国两大阵地，其他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强国的传播学学科均表现不佳。荷兰的传播学院系虽师从美国，但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局面，譬如，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传播学院已经排名全球第一。³⁸英国的传播学院系坚持和捍卫批判学派的传统，学术表现则中规中矩，前50名中只有1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来自于英国。

南美洲和非洲还是传播学发展的不毛之地，传播学在其洲内的大多数国家中基本上还未成为独立学科。在亚洲，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大国如同非洲和南美洲一样“贫瘠”，而以色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则统领亚洲，在前50名中占据了3席。这三个地区的新闻传播学院系的优异表现受益于大量在美国接受了系统传播学训练的学者的回归（祝建华，2002）。

2. 传播学院系研究水平的影响因素

无解释变量的三层多水平模型（混合效果）的组间方差占比（组内相关系数-ICC值）为9%。添加多个解释变量后，残差方差大幅减少，组间方差基本被解释变量完全解释（组间随机效果=0），因此随机截距的多水平模型是恰当的（随机斜率的模型因不能收敛而无法保留）。解释变量的固定（fixed）效果如表3所示。

表3：多水平回归模型

	系数	T值	显著性（p值）
截距	-0.123	-1.964	0.053
院系研究领域的持续性	-0.022	-4.299	0
院系的社会网络值	0.157	6.743	0
院系的研究历史	0	-0.177	0.859
院系的发文学者数	0.039	24.6	0
院系的跨学科能力	0.278	1.913	0.050
院系的机构形式	-0.01	-0.165	0.869
大学的办学收入	-0.004	-0.157	0.875
地区的英语能力	-0.003	-1.779	0.086
注：删除缺失值后，分析样本包括了721个院系，550个大学，55个国家或地区			

多水平建模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院系研究领域的持续性和跨学科能力（院系的发展战略）、院系的社会网络值（社会资本）、院系的发文学者数（文化资本）显著地影响了传播学院系的研究表现，然而院系的研究历史（文化资本）、国家或地区的平均英语能力（文化资本）、大学的办学收入（经济资本）、院系的机构形式均未起显著作用。具体来说，院系研究持续性越差（发表论文涉及的研究领域数目越多），其学术研究的整体表现就越差。相反，院系的学者的跨学科能力越强（每个研究引用其他学科的文献越多），其院系的研究表现就越强。同样，院系的学术合作网络越广、角色越关键，其院系的研究表现就越好。此外，院系拥有的科研师资也正向地影响了院系的研究表现。

五、讨论和结论

（一）对研究发现的讨论

传播学学科有多个源头，这些源头在不同高校呈现了不同的发展轨迹。部分源头始终独立发展，即使在同一所学校也互不相融。源于言语传播的院系一贯坚持以言语传播为中心，强调传播的“沟通”本质，长期以人际传播研究为重心，后来扩充到了符号系统（code systems）、家庭传播、健康传播、跨文化传播、教育（instructional）传播、组织传播、言语传播、语用（pragmatic）传播（研究辩论技巧等）、公共演说研究、戏剧研究、修辞和传播理论等研究领域（李金銓，2014）。源于新闻职业教育的院系则一向坚持“新闻人”的宗旨，无论机构名如何变化仍自称是“新闻学院”；按照凯瑞³⁹的看法，此类学者秉承的是传播的“传递观”，通常研究大众传播、新闻学、广告与公共关系、媒介心理学、媒介科技（新媒体）、媒介法和媒介经济等。源于农业传播的院系不忘初心，扎根于生命科学，专注于科学传播（对公众传播科学观念和知识）。而社会科学起源的传播学院系则坚持社会科学的信念，不涉猎新闻教育和言语传播，主要研究政治传播和传播史等。同时，传播学学科越发达、历史越悠久的大学，其传播学学科建制越复杂、越少改变。皮特斯（Peters，1986）认为这种过分机构化的情形阻碍了传播学核心知识的形成。但也有院系经历了一步步升级、合并或重组后实现了统一建制，这类学校“变”的背后通常是大学应强势管理层优化资源的需要做出的改变，进一步来讲，也是各种派系角力后为保护自身利益而不得不妥协的结果。

作者经数据分析后发现，决定传播学院系学术表现的核心要素是院系所直接拥有的人力资本（属于文化资本的一种）、社会资本以及院系的发展战略，而由院系

的研究历史构成的文化资本、国家/地区层面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院系的机构形式并不重要。英语通常被认为是非英语地区学者论文发表的障碍之一，但本研究发现国家/地区的平均英语水平与个体院系的学术表现没有任何关联，而这也与祝建华（2002）的推测相符。经济资本被布尔迪厄等人认为是其他资本的基础，但大学的经济资本若要转化为学术生产力和影响力，仍将不可避免地受制于院系已有的文化和社会资本。传播学在大学是否完成制度化（以独立的院系形式存在）虽一直被认为是决定学科发展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但本研究的实证数据并未支持这样的臆断。同理，一个大学的传播学学科是否完成制度化虽主要取决于经济资源的多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是影响学科学术表现的决定性因素。此外，研究发现学科发展历史也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学科发展历史是宝贵的遗产，但是，某个院系的研究历史越久，就越可能习惯于沉浸在自己的舒适区，不求创新，形成所谓的历史包袱（Yu, Dong, Shen, Khalifa & Hao, 2013），反倒不利于学术表现的进步。

（二）结论

正如制度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不变”（stability）是学科制度发展的主流形态（Greenwood, Oliver, Lawrence, & Meyer, 2017; Scott, 1995）。因为一个领域一旦开始形成，领域内的组织机构就有可能通过强制（coercive）、模仿（mimetic）和标准化（normative）这三种同质化进程使机构之间变得越来越相似（DiMaggio & Powell, 1983; Scott, 1987）。在美国等发达地区，传播学已经完全实现制度化，“大学校”基本不变，而“小学校”则频变，甚至巨变。⁴⁰譬如“常青藤”学校（如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或者超级名校（如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西北大学等）在初期建立根基后，便长期保持不变或者只是微变。更多的“常青藤”学校和超级名校则因为不需要像新闻传播这类只有丰富生源和业界经费资助、而没有学术严谨性及很大科研贡献力的专业，所以至今仍未实现传播学学科建设的制度化。⁴¹名校的“不变”与其办学资金充裕、“博雅”（liberal arts）的治学理念及培育社会“精英”的发展战略有很大关系（Chan, 1996）。对于中小型大学来说，招生的成效关系到学校的办学资金和学科的发展战略。院系的改革常常以院系招生的稳定性和校外办学资金额作为决断的基础，传播学学科的合并是“资源合理配置和优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传播学院系的名字和归属在这类学校会经常发生变化。⁴²正如Scott（1987）等制度学家认为的那样，制度化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争取机构存在的合法性而不是业绩表现。因此，是否实现传播学学科的制度化并不会实质性地影响院系

的学术表现，能够影响到的或许只是其政治地位的高低和经济资源的多寡。

从另一角度来看，美国名校的传播学院系的稳定性也是其学科惰性（disciplinary inertia）的一种体现。这印证了西方学者的普遍看法——（原）殖民地地区非常僵化地进行着知识的生产和流通，而这种知识的交换实质上是基于确证和熟悉度产生的渐变（incrementally evolve）（Connell, 2007; Zelizer, 2016）。以渐进模式变化的学科具有连续性，它意味着学科的稳定和其在知识共享中占据的重要地位（Kuhn, 1970）。但是，这样以熟悉度作为准绳的学科发展和变革模式阻碍了学科的创新，无疑会错失学科发展的良机。

（三）对中国传播学学科建设的启示

本文的研究发现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如何开展我国的传播学学科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对于中国等传播学学科起步较晚的国家来说，其高校院系不应该盲目模仿、复制美国等发达国家传播学学科的发展模式，这是因为：首先，模式并非千篇一律，简单地复制此种模式必然忽略其他模式的优点，正所谓顾此失彼。⁴³其次，美国传播学学科目前存在的各种形式主要是出身不同的派系在夺取正统、资源和权利的斗争过程中互相妥协的结果，这些模式形成的背后是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与经济等力量的协同作用，因此，仅仅照搬形式上的模式可能会造成“南橘北枳”的后果。而且，学科建设的目的并不是促成形式上的建制，本研究的数据分析已充分证实了机构的任何存在形式均与学术表现没有直接关联。再者，相较于美国传播学学科发展的最大羁绊——不同出身的学派之间为学科正统性和合法性地位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而言，中国则完全没有历史包袱的束缚，诸如言语传播、媒介研究、大众传播、营销传播（广告与公关）、科学传播等在美国众多学校“水火不容”的领域应该被整合起来，而不是厚此薄彼。

此外，虽然本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影响院系学术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但仅仅引进“海归”并不是学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策略，因为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人力以及经济资本需要在院系制定适当的学科发展战略、科学合理地使用文化和社会等资本的前提下才能发挥有效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全球传播学学科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仍然值得我们参考。可以预见，通过院系重组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调配与使用对于机构学术生产力具有积极作用。我国传播学学科建设的核心应当专注于制定适当的、以促进跨学科研究能力为要旨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加强与发达地区传播学院系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保持和促进师资研究领域的持续性。

（四）研究意义与局限性

相比于已有利用Web of Science数据库所做的研究，本论文具有以下五个不同的特点：

首先，以往此类研究的数据范围大多仅限于SSCI期刊论文，而本研究的数据则包括了被SSCI、SCI和A&HCI三大权威索引收录的所有期刊，因而可以更全面、客观地反映传播学学科由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计算机等）复合交叉的现实。

其次，以往此类研究大多是事先选定部分与传播学相关的期刊，随后进行论文搜寻，这样操作无疑会带来遗漏复合型传播学学者发表在非传播学期刊的论文的问题。本研究是迄今为止第一个用大数据挖掘的方法（挖掘了所有传播学机构发表的论文及其学者发表的与传播学主题相关的论文）来探究全球传播学学科发展史的研究。

再次，不同于以往采用描述性统计、且以分析论文发表量为主的此类研究，本研究以120年来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与传播学有关的论文为线索，用实证结合文献和档案分析的方法，梳理了传播学学院系的发展历程、脉络和规律，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实证检验了影响传播学院系学术表现的因素。

另外，本研究还开发了测量传播学院系学术表现的量表，并以此为标准对全球1540个传播学院系进行了排名。相比于QS和泰晤士高等教育等机构基于若干不同范畴的指标进行主观加权计算的排名规则，“本研究的排名规则是基于对8个变量构成的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后生成的因子值进行从高到低的排序，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

最后，本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上，研究发现了在影响传播学院系研究表现的因素中，院系直接拥有的社会和人力文化资本（human capital）比经济资本更加重要。在实践上，本研究的发现为传播学院系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思路和启发性建议。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几个局限性。首先，本研究建立的多水平模型没有发现传播学院系的学术表现与各个影响因素的关系存在国家间的差异（随机斜率模型不成立），但必须强调的是：这样的发现主要是基于英文期刊论文的发表（分析数据中收录有少量的西班牙语、荷兰语、德语、法语等非英语期刊论文），因此此部分研究结论可能更适用于美、英、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或地区。对于中国等非英文期刊论文发表为主的国家或地区，还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补充大量的中文等非英文

发表,并对其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其次,传播学院系的学术表现主要以论文为基础的发表量和引用量等指标来测量,没有考虑专著和书籍的影响。当然,产生这一局限性的原因是目前未有收录全球所有传播学学者及其不同语言的专著的数据库,因此,对于专著和书籍的测量不具有可操作性。另外,传播学院系的学术表现也未考虑传播学院系对本地区传播教育与实践的贡献大小,因为还没有公开可用的数据能够测量出全球范围内各个传播学院系对社会与实践的贡献。未来的研究也许可以采取对全球传播学院系进行小样本抽样、或进行个案研究,以补足院系的专著发表、对本地区传播教育与实践的贡献大小与论文数据和其他影响变量的差异。

由于无法生成具有时间序列特征、且与机构学术表现相关的变量,因此本研究未分析时间这一变量对于不同形式的研究机构的学术表现的影响,这导致研究者无法获悉同一机构通过不同时间的院系重组战略(合并、重组、拆分等)是否会带来学术效率的实质性变化。再者,研究所需的数据主要来源于Web of Science、美孚教育和泰晤士高等教育,未考虑大学的国际化水平(境外来源的师资、拥有海外学习经验的师资等)这一因素的影响。因为即使这些变量的数据能够获得,其也不适用于英美等发达国家,所以最终没有整合到理论框架中。最后,本论文的理论框架虽是以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为基础来搭建的,但由于把资本理论这一人文批判流派的宏大理论降为实证的中层理论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研究者只能简化资本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因此在操作层面,用数据库已有的变量来测量这些复杂的概念会有结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不足的隐忧。

(责任编辑:卢芳珠)

注释 [Notes]

1. 作者感谢刘海龙、吴予敏、尹连根、沈福元、晏青等老师以及两位匿名评审对论文的初稿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也感谢沈鑫、林志良、罗楠、何意如和朱姗提供的技术支持和协助。
2. 西方大学的制度、架构和组织形式各有不同,大学下面的第二级机构一般叫做学部(美国叫做college,即大学院,而英国传统叫做faculty,即学部),第三级机构叫做学院(school)或者系(department)。College的负责人叫做院长(dean),有些实力强大的school被学校直属(二级学院),负责人也叫dean,从属于college或faculty的school(三级学院)的负责人叫做总监(director。也有叫做主任,即head,但在中国香港也有学校称其为院长),系的负责人叫做主任(head或chair)。
3. 布尔迪厄曾定义文化资本为教育程度,也把社会阶级的地位和阶级文化归为文化资

- 本 (Bourdieu, P., & Passeron, J.-C.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culture and society*. Beverly Hills: CA: Sage), 并认为文化资本分为具体化的、物化的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I. Szeman & T. Kaposy (Eds.), *Cultural theory: An anthology* (Vol. 1, pp. 81-93). Westport, CT: Greenwood.】。本研究根据数据库的现实情况, 对这一庞杂的概念进行了简化, 用人力资源和英语能力来测量文化资本。
4. 布尔迪厄定义社会资本为与拥有已制度化的、相互熟识并认可的持久性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I. Szeman & T. Kaposy (Eds.), *Cultural theory: An anthology* (Vol. 1, pp. 81-93). Westport, CT: Greenwood. 关于社会资本的其他观点, 请参阅: Siisiainen, M. (2003). Two concepts of social capital: Bourdieu vs. Putna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 40(2), 183-204; Lin, N. (2008).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The handbook of social capital*, 50(1), 69.
 5. 学术表现可以包含发表数、引用数、学术地位、对社会的贡献等维度。Bazeley, P. (2010). Conceptualizing research performance.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35(8), 889-903本研究对这一概念采用以发表数和引用数为核心的8个变量来测量(见研究部分)。
 6. 包括两个类别: 院系的形式(学部、学院和系)及非院系的形式(中心、专业和研究所等)。
 7. 通过计算Rao-Stirling Diversity Index得到。Porter, A. L., & Rafols, I. (2009). Is science becoming more interdisciplinary? Measuring and mapping six research fields over time. *Scientometrics*, 81(3), 719.
 8. EF SET. (2018). English proficiency ranking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f.com.hk/___/~/media/centraleftcom/epi/downloads/full-reports/v8/ef-epi-2018-chinese-traditional-hk.pdf
 9. 由于改名或者影响因子太低而被剔除索引, 因此有些期刊已不在最新的Web of Science传播学目录下。
 10. 因为communication、media等词具有歧义, 所以出现了很多如通信、物理介质等无关的结果。
 11. 请参阅刘海龙有关传播研究史的五种分类方法(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 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12. 三大顶尖期刊的确定是根据所有的传播学类 SSCI期刊1997年到2018年的平均影响因子来确定(完整的期刊排名名单请参阅figshare.com/s/d7c1d0d53d3eeaa8cf6f)。
 13. 所有的统计量只计算第一作者的发表。主成分分析的载荷均高于0.9, 累积方差贡献值达到了90%。通过Cronbach's Alpha计算的信度值达到了0.93。
 14. 包括两个类别: 院系的形式及非院系的形式(中心、专业等)。
 15. 发表的论文所属的Web of Science学科类目总数。
 16. 通过计算Rao-Stirling Diversity Index得到。Porter, A. L., & Rafols, I. (2009). Is science

becoming more interdisciplinary? Measuring and mapping six research fields over time. *Scientometrics*, 81(3), 719.

17. 通过主成分分析院系的国际合作数（载荷=0.77）、学术合作网络的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载荷=0.95）和度中心性（degree）（载荷=0.89）形成的唯一社会网络因子值（累积方差解释率达到了76%）。通过Cronbach's Alpha计算的信度值达到了0.90。
18. 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至今仍保留了言语传播系的名称，并与新媒体和设计等合并成了艺术与传播学院。
19. 夏威夷大学的言语传播后来发展成为了传播科学系（虽然英文也用了communicology，但与communicology的另一派——“交流学”的质化路径不同，其强调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交换，所以这一communicology派可以被译为传播科学）。该校同时还存在一个以新闻教育及大众传播研究为主的传播学院。UH Mānoa Department of Communicology. (2019). About our Department. Retrieved from <http://manoa.hawaii.edu/communicology/about.html>在南伊利诺斯大学艾德华兹维分校和阿肯色大学小石城分校则演变成了应用传播系。在一些大学【如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等】，言语传播与修辞和戏剧始终结合在一起并保持至今，但新闻和广告流派则在大众传播学下建立了自己的机构。
20. 李金铨（2014）。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一些个人的初步思考。《传播研究与实践》（台湾），（1），第1-21页；Ward, W. B. (2000). *History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t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Y: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Life Sciences at Cornell University; 参阅黄旦（2018）。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新闻与传播研究》，（10），第60-81+127页；吴信训（2009）。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百年流变。《新闻与传播研究》，（06），第26-37+106页；Edd Applegate., *The rise of advertis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 a history of innovation to 1960*, Lanham: Scarecrow Press, 2012.有关美国早期新闻教育的详细介绍。
21. 麦迪尔新闻学院在1991年后加入了广告职业教育，学院名称也改为新闻、媒体与整合营销传播学院。
22. 虽然名称都叫做新闻（与传播）学院，部分是学校直属的二级学院（如密苏里、哥伦比亚、麦迪逊分校和西北大学麦迪尔等），地位相当于学部，负责人是dean（院长），下面一般设置有系；但更多的是学部下属的三级学院，负责人是director（虽然中文一般翻译成院长），下面一般也不再设置系，但在拥有的学科地位和资源上略大于系。
23. 部分大学【如南达科塔州州立大学（South Dakota State）】的农业新闻/传播系脱离农学院与口语传播出身，最终合并成为新的传播与新闻学院。
24. 在1980年代传播学成为普遍接受的学科后，很多小型大学从一开始建立传播学系便包含

了新闻、广告、言语传播、媒介研究等方向。传播学之所以能够在这些小学校非常容易地实现学科制度化,是因为学校除被迫集中有限资源投入建设完整的传播学学科外别无选择。

25. 1947年成立公共关系学院,1984年改名为传播学部,并沿用至今。Wright, D. K. (2011).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public relations education in North America: A cri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15(3), 236-255.
26. 华盛顿大学曾经存在的技术传播系已经改名为以人类为中心的设计和工程系(Human Centered Design & Engineering),极少数大学【如俄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等】与新闻学院(系)合并为一体。技术传播方向在多数学校(如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等)还基本上停留在文学院下设的英语系或工程学院设置的通识课,它们普遍以为职业、商业等应用提供修辞、设计、技术性与创意写作等教研为主。
27. 其初始于1926年社会科学院下属的新闻学分部(division),1955年与言语系合并并改名为传播和新闻学系,1963年由施拉姆推动改名为传播学系(隶属于人文与科学学院)。Stanford University. (2019).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Stanford.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Retrieved from <https://comm.stanford.edu/about/files/39/about.html>; Lindley, W. R. (1976). Chilton Bush: The Great Innovator. *The Journalism Educator*, 31(3), 18-23; Stanford University. (1964). Stanford Courses and degrees 1963/1964. *Stanford Publications - Spotlight at Stanford*. Retrieved from <https://exhibits.stanford.edu/stanford-pubs/catalog/nm461yk1026>.
28. 部分学校【如夏威夷大学希洛分校(University of Hawaii at Hilo)等】只有言语传播发展起来的传播学系,没有新闻系;相反,一些学校(如哥伦比亚大学等)只有新闻教育发展起来的新闻学院,而没有言语传播派系派生出来的传播学系。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2019). History |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Retrieved from <https://wmich.edu/communication/about/history>.
29. 存在多于一个传播学院系的大学完整名单,请访问: figshare.com/s/d7c1d0d53d3eeaa8cf6f
30. 不同颜色的线条和文字代表一个完整的演进过程。在例子中,大学名加上院系名字代表了该大学传播学院系最近的名称。
31. 红色代表传播学科内部的组合,绿色代表与其他学科的组合。线条粗线代表出现频次的多寡。为了降低网络图的复杂程度,名称的组合没有考虑先后顺序。院系名称中间的“:”代表了原英文名称中出现的“and”。研究者对于部分中文名字非常接近的院系名称进行了特殊的处理,譬如,communication research和communication studies分别翻译为传播学研究和传播研究,media research和media studies分别译为媒体研究和传媒研究。
32. 因为是120年的历史数据,所以也包含了苏联等已经不存在的国家实体。
33. 存在二个、三个、四个和五个传播学系的比例分别为16%、3%、0.1%、0.08%。

34. 上述的统计分析结果与Fisher精确检验（处理频次少于5的数据更加准确）的结果完全一致。
35. “院系的全球排名”依据的是对院系研究表现进行8个变量量表测量和主成分分析后生成的因子值从高到低的排序。“大学的全球排名”是基于该大学所有与传播学相关发表的因子值加总。原始量表其他变量的统计方法请参见研究方法部分的介绍。本研究也制作了包含全球1540个大学的榜单，请访问：<https://figshare.com/s/b72b5d5e40546af0b8dd>
36. 因为许多大学里存在不只一个传播学院系，大学的全球排名是指包含了该大学里全部与传播学相关的院系后的综合排名。
37. 同时列出了它们所属大学的传播学整体研究水平的排名，但由于部分大学存在不止一个院系从事传播学相关的研究，因此这部分大学的排名和院系排名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譬如，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有三个相互独立的院系排名均位列全球前50，因而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这个大学的综合排名位列全球第一。
38. 这似乎与QS 2019年后的媒体与传播学科全球排名结果一致，但是如果以大学为单位，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包含了至少三个著名的传播学院系，因此学术综合表现排名全球第一，而阿姆斯特丹大学整体排名全球第四。
39. Nordenstreng, K. (1968).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Gazette (Leiden, Netherlands)*, 14(3), 207-216; Carey, J. W. (2008).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Revised Edition*. Hoboken: Taylor & Francis; Greenwood, R., Oliver, C., Lawrence, T. B., & Meyer, R. E. (2017).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London: Sage.
40. Nature的一项研究（Wu, L., Wang, D., & Evans, J. A. (2019). Large teams develop and small teams disrup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ure*, 566(7744), 378-382.）发现大团队通常因循守旧，小团队则勇于开拓进取、富于创新。
41.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顶尖名校都有人文和艺术方向的媒体专业或方向（concentration），但没有建立系。
42. 另外一种罕见的例子出现在威斯康辛大学斯托特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Stout），虽然有一个艺术、传播、人文和社会科学部（College of Arts, Communic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但其重心在艺术传播和信息处理领域，言语传播与新闻职业教育均以辅修学位课程（minor）的形式存在。
43.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新闻传播学院基本上是复制美国新闻职业教育出身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的发展模式。黄旦（2012）。传播的想象：兼评中国内地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径。载冯应谦，黄懿慧（主编），《华人传播想象》（第75-98页）。香港：商务印书馆。

44. 研究者对其原始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发现生成了4个因子。因此,它们排名依据的量表不具备效度。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常文磊(2014)。《英国科研评估制度与大学学科发展》。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 方文(2008)。《学科制度和社会认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韩水法(2002)。大学制度与学科发展。《中国社会科学》,(3),77-78。
- 李金铨(2014)。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一些个人的初步思考。《传播研究与实践》(台湾),(1),1-21。
- 王怡红(2012)。导读:我们从美国传播学科史研究中读到什么?载胡翼青(主编),《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祝建华(2002)。传播研究国际化的国际经验:个人学术训练与机构奖惩体制的影响。载《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
- Abbott, A. D. (2001). *Chaos of disciplin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cher, T. (1989).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s of disciplines*. Milton Keynes [England]; Bristol, PA., USA: 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75). The specificity of the scientific field and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progress of reason. *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14(6), 19-47.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I. Szeman & T. Kaposy (Eds.), *Cultural theory: An anthology* (Vol. 1, pp. 81-93). Westport, CT: Greenwood.
- Chaffee, S., & Rogers, E. (1997). Wilbur Schramm, the Founder. In S. Chaffee & E. Rogers (Eds.),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 A Personal Memoir* (pp. 126-176): Sage.
- Chan, J. M. (1996). Whither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Asia? *Asia Pacific Media Educator*, 1(1), 16-27. Retrieved from <https://ro.uow.edu.au/apme/vol1/iss1/3>.
- Connell, R. (2007). *Southern theory: the global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Malden, MA: Polity.
- Craig, R. T. (2012). Communication as a Field and Discipline.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
- Daly, J. A., Friedrich, G. W., & Vangelisti, A. L. (1990). *Teach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methods*. Hillsdale, N.J.: L. Erlbaum Associates.
- DiMaggio, P. J., & Powell, W.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47-160.
- Eadie, W. F. (2011). Stories We Tell: Fragmentation and Convergence in Communication Disciplinary History.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11(3), 161-176.
- EF SET. (2018). English proficiency ranking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f.com.hk/__/~/media/centralefcom/epi/downloads/full-reports/v8/ef-epi-2018-chinese-traditional-hk.pdf.
- Greenwood, R., Oliver, C., Lawrence, T. B., & Meyer, R. E. (2017).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Sage.
- Gulbrandsen, M., & Smeby, J.-C. (2005). Industry funding and university professors' research performance. *Research Policy*, 34(6), 932-950.
- Huang, M.-H. (2012). Exploring the h-index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A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 36(4), 534-547.
- Jensen, K. B. (2002). *A handbook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ologies*. Lond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Johnes, G. (1988). Determinants of research output in economics departments in British universities. *Research Policy*, 17(3), 171-178.
- Kuhn, T.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öblich, M., & Scheu, A. M. (2011). Writing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 Sociology of Science Approach. *Communication Theory*, 21(1), 1-22.
- Luukkonen, T. (1990). Invited Review Article: Bibliometrics and Evaluation of Research Performance. *Annals of Medicine*, 22(3), 145-150.
- Merton, R. K. (1968). On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 In R. K. Merton (Ed.),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Miller, S. (2010).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stitutions : a philosophical study*. Cambridg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ters, J. D. (1986).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intellectual poverty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3(4), 527-559.
- Pooley, J. (2008). The New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D. W. Park & J. Pooley (Eds.), *The histo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contested memories*.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Rogers, E. M. (1994).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New York, NY: Free Press New York.
- Scott, W. R. (1987). The adolescenc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2(4), 493.
- Scott, W. R. (1995).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Founda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science. *London*:

A Sage Publication Series.

Sproule, J. M. (2008). *Communication from concept to field to discipline*. New York, NY: Peter Lang.

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18, 2018/09/07/T15:58:00+01:00).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9: methodology. *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methodology-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9>.

Ward, W. B. (2000). *History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t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Y: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Life Sciences at Cornell University.

Yu, Y., Dong, X.-Y., Shen, K. N., Khalifa, M., & Hao, J.-X. (2013). Strategies, technologies,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for developing organizational innovativeness in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6(12), 2507-2514.

Zelizer, B. (2016). Communication in the Fan of Disciplines. *Communication Theory*, 26(3), 213-235.